

剑桥大学出版社「经济学前沿理论」书系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Revisited

Frontier Theories of
Economics

制度经济学回顾 5 反思

〔日〕繁人都重 著

张敬惠等 译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by Shigeto Tsuru

剑桥大学出版社「经济学前沿理论」书系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Revisited

Frontier Theories of Economics

制度经济学回顾与反思

〔日〕繁人都重 著
张敬惠等 译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by Shigeto Tsuru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Revisited by Shigeto Tsuru

ISBN: 0-521-59972-5

Copyright ©Shigeto Tsuru, 1993, Exclusive licensee1993-1996

Banca Commerciale Italiana, Milano, Italy

本书版权合同已向四川省版权局申请登记。登记号:图引字
21—2003—02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制度经济学回顾与反思/(日)繁人都重著;张敬惠等译.成都: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6

书名原文:Institutional Economics Revisited

ISBN 7-81088-182-5

I. 制... II. ①繁... ②张... III. 新制度经济学 IV.
F091.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2852 号

制度经济学回顾与反思

[日] 繁人都重 著

张敬惠等 译

责任编辑:白雅

封面装帧:穆志坚

出版发行: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四川省成都市光华村街 55 号)
网 址:	http://www.xcpress.com/
电子邮件:	xcpress@mail.sc.cninfo.net
邮政编码:	610074
电 话:	028-87353785 87352368
印 刷:	四川机投气象印刷厂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6.375
字 数:	152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088-182-5/F·159
定 价:	18.00 元

1. 如有印刷、装订等差错,可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2.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序 言

我之所以提出“回顾与反思”制度经济学是因今天的经济学研究杂乱而无章，^①我发现制度主义作为一个流派有重新评价的必要；它对经济学家们当今要解决的一些问题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制度主义”这个词过去一直都用来指 1890 年发端于美国的那场学说运动。当时，索尔斯坦·凡伯伦（Thorstein Veblen）在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他与约翰·康芒斯（John Commons）、卫斯里·米歇尔（Wesley Mitchell）被认为是制度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

不过，就像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在其经典的教科书中所说的那样，对这场运动正统的评价是“四十年前制度主义在经济学中就已经凋零枯萎，没有什么地位了”。^② 肯尼斯·E.

① 董·路斯与彼得·混乱的经济学，牛津：布莱克维尔，1984

② 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第 11 版，东京：麦格劳-希尔，1979。在与诺斯豪斯合编的第 12 版中（1985 年），他甚至已经没有任何提制度主义了。

2 制度经济学回顾与反思

伯尔丁 (Kenneth E. Boulding) 把社会学、自然科学引入到了经济学的研究中, 从而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他也曾把制度经济学说成是“一个小插曲, 各种功利的原因使它在 19 世纪 30 年代终结了”。^①

对这样的评价我不敢苟同。我愿借此机会在我的系列演讲中说说我的原因。

在我的演讲初始, 我引用了艾伦·G. 格鲁齐 (Allan G. Gruchy) 的一段话。他最近把“制度经济学家”的特点概括为“研究技术变迁对经济体制的结构和功能的影响、各经济利益集团的权利关系、工业化进程的涵义以及国家目标和优先项目如何决定等问题”。^②

如果这样定义“制度主义”正确的话, 那么, 我想说我们可以把振兴经济学研究的希望寄托在格鲁齐给我们指出的方向上, 将其重点特别放在“技术变迁对经济体制的结构和功能的影响上。碰巧的是, 马克思在论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时, 恰恰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所以, 基于这个原因, 我的演讲以论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开始。

① 肯尼斯·E. 伯尔丁: 重看制度经济学, 美国经济评论, 1957 (5): 1

② 艾伦·G. 格鲁齐: 制度经济学: 发展与前景, 见: 罗夫·斯蒂普帕策, 左格沃尔斯, 赫曼·哈兹菲尔德: 制度学途径的经济学: 纪念威廉·卡普论文集, 马萨诸塞州: 莱克星顿书局, 赫思有限公司, 1971. 11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重新评价广义上的作为制度主义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1)
第二章 凯恩斯与马克思：总量法的比较	(15)
第三章 马克思与熊彼特：经济周期的比较	(37)
第四章 制度经济学在美国	(54)
第五章 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	(67)
第六章 制度经济学的未来 I：取代国民生产总值	(79)
第七章 制度经济学的未来 II：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混合经济	(97)
争鸣篇	(111)
作者自传	(165)
BIBLIOGRAPHY	(176)
REFERENCES	(183)
译后记	(196)

第一章

重新评价广义上的作为制度主义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最大特点是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强调区分和整合“现实”(real)的和“价值”(value)的一面。例如他曾这样写道：^①

人类的劳动过程……是为了生产使用价值，以自然界的物质满足人类的需求；它是人与自然进行有效交换的必要条件。它是自然界对人类生存施加的永恒的条件。所以，它是独立于人类生存的每一个阶段的，或者说是每一个阶段都存在的……稀饭的味道并不会告诉你是谁种的燕麦；这一简单的过程也不会告诉你它成长的社会条件。例如它是在奴隶主的皮鞭下种的呢，还是在资本家焦急的神情下种的？是古罗马的辛辛纳图斯在自己不

^①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莫斯科：外国语言出版社，1954—1962.183~184

大的农场播种而得的，还是以石头狩猎为生的野人种的？他还写道：^①

连小孩子都知道，任何民族如果停止了运作——我想说不是一年——只是几个星期，那么这个民族就会灭亡。对应于各种需求的产品数量相应地要求有各种各样的由定量决定的社会总劳动，这也是妇孺皆知的。显然，社会劳动的这种按比例分工的必要性根本不会被具体的社会生产的某种方式所否认，只能改变其外在形式而已。自然法则是永远不会被否决的。只有赋予了法律保护的那种形式才可以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发生改变。这种按比例进行社会分工的方式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将会显示其作用，并且其间社会劳动是因私人劳动的私下交易而形成的，这正是那些产品的交换价值所在。

社会生产现实的一面是实物（physical）的，它超越了社会经济制度的具体形式；而价值的一面则因其反映了某一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而是社会性的。马克思不仅仅关心这两者的差异，更渴望考察它们的互动联系，诸如技术进步（实物层面）对经济制度（社会层面）的结构和功能的冲击，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反作用。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的著名的生产力一定要适合生产关系的论断正是与马克思的这一方法论紧密相联的。

作为现实层面的生产力可以被比喻为水温的上升；而作为价值层面的生产关系具体的制度安排则可以被喻为冰、蒸汽等水元素的形成。马克思的观点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导致其自身社会特点的加强，而这与生

^① 卡尔·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一封信。见：德拉姆芒德译，资本论书信集，新帕克出版有限公司，1983

产方式私人所有制的特点相冲突。马克思认为，这种冲突最终将通过“资本主义外表的迸裂而得到解决”。^① 不过，就在这一论述之前，马克思推出了其著作中最富揭示意义的文章之一，文中详论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现实层面和价值层面：

与这种积聚（资本）或资本家对资本的占有日渐集中到少数人手里相伴而生的是，劳动过程中的合作形成了，且规模不断扩大，科学被有意识地应用于技术改进中，新的土地耕作方法被运用，劳动设备向标准化转变。各种生产手段结合在一起，劳动的社会化，各个民族在世界这个市场上水乳交融，从而，资本主义政体也就有了国际化的特点。^②

这段话是马克思在 100 多年前写的，意义不同寻常的是，文中富有洞察力的预言如今在很大程度上都得到了证实。正如华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所言：

这一记录（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长远分析）的确令人印象深刻，它包括财富日渐集中、中小企业迅速消亡、对竞争逐渐施加限制、技术不断进步并伴之以固定资本日显其重要性。最后，同样重要的是，经济周期反复发作，其强度并不会有所减弱。这一系列在现实中得到印证的预言，无人能及。反观现代经济理论的所有精华，也实难发现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

那么，马克思这一系列成功的预言对现代经济理论有什么意义呢？那些认为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已经作了

① “社会”在此处指“社会互为关联的”（socially interrelated）或劳动中的“合作”形式。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莫斯科：外国语言出版社，1954—1962.763

决定性、终结性发言的人让我们不要枉费心思，苦思冥想；也有一些评论家则没这么乐观——或者我应该说他们有些悲观。希曼（Heimann）教授在其著作中对他们的态度有很好的表述，“马克思为我们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最具综合性、给人印象最深的范式。所以，马克思经济思想之于现代经济理论的意义变成了一个方法论的问题”。^①

更有意义的是，马克思还做了一个更具长远性的预言：人类将在自动化的使用上取得长足的进步，这将对现实层面和价值层面之间互相作用的张力产生很大的影响。他说：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对劳动时间和劳动数量的依赖越来越小，转而更多地依赖生产工具。这些生产工具以及使用它们所带来的巨大的效应和生产中所需要的直接劳动时间是不成比例的；它们的有效性严重仰仗于科技进步的程度。换句话说，科技被应用到生产中后，人类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就不再显得那么封闭了——人们很容易把自己看成生产过程中的监督者和管理者……他们不涉足生产过程，不是其中的主要参与者。在这种角色转换过程中，生产与财富的创造既不是由人的直接劳动也不是由其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取决于他自身可以发挥出多少一般生产能力，亦即社会生活为他提供的对自然的了解和支配——一句话，“社会个体的发展”。一旦人类劳动不再以直接的方式成为创造财富的源泉，劳动时间就会——而且也必须——终止其

^① 华西里·列昂惕夫：马克思经济学对当代经济理论的意义，美国经济评论，增刊，1938（3）：5

衡量财富价值的功能；使用价值也不能由交换价值来衡量了。从而，依赖于交换价值的生产方式就此崩溃了。^①

正如前文所述，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最终会束缚生产关系的转变，并且随着自动化的发展和其他科技成果在生产领域中的运用，限制单个劳动者的劳动对形成最终产品的约束必将不复存在。这样，社会个体就逐渐形成了。如果在交换价值基础之上的生产方式因此而被破坏的话，要素（工资率和利息率）的定价自然会失去市场的客观公平性，并且会成为权力关系的产物。

在生产关系的演进中，我们或许已经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中了：私有企业（至少是在加尔布雷斯所说的“计划体制”中）可以或多或少决定赊销比例。如果工人们组织有序、团结一致的话，他们也可以得到他们要求的工资。要素的定价不是在市场竞争中完成的，而是人为操纵的产物。可以预计，“看不见的手”会受到进一步的伤害。市场不再是一个消费者的自主权益可以忠实地传递到供应商那里的公平舞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得承认，要素市场并未发挥人们期待的作用，即客观公正地根据要素对总产品的贡献率来决定其回报率。事实上，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我们或许会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一个要素的边际投入会越来越难以获得相应的增值产出。

在前面引用的马克思的那段话里，马克思预见生产关系将会演进到这样一个阶段：“劳动时间就会——而且也必须——终止其衡量财富价值的功能；使用价值也不能由交换价值来衡量了。”换句话说，社会将逐渐变成一个由“自由个体组成的社区，人人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柏林：笛茨·沃莱格，1953.592，596。见：赫伯特·马库·维人，伦敦：卢特齐·基冈·保罗有限公司出版，1964.35~36

都以共同的生产方式劳作，个人劳动力被有意识地当做社区劳动力的集合来使用。”^①“收入”(income)这个概念也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社会最终将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

也就是说，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作为实物层面的技术进步在作用于社会层面的生产方式时，生产方式在主要方面经常会发生性质上的变化。与之相对照的是新古典范式，该学派的传统是尽可能从现实范畴(real categories)解释价值关系，诸如消费品的边际效用和劳动的无效用(disutility)。

在发展现代宏观经济理论上起先锋作用的经济学家，如凯恩斯(Keynes)、哈罗德(Harrod)等人分别意识到了在进行单位选择(choice of units)时所碰到的那种特有的困难。这种困难来自于生产过程，特别来自于整个经济制度的两重性(价值层面和实物层面)。庇古(Pigou)是用扣除“正常”的折旧来计算净国民收益的，凯恩斯在批评这种方法时做了一个很有揭示意义的评论，他说，“由于这种扣除不是体现在现金上的，他就会笃信实物的数量可能会发生变化，尽管这种变化并不存在，即他是在不声不响地把价值变化引导进来”。^②众所周知，凯恩斯计算净国民收益的办法是采用劳动单位和工资单位。哈罗德也在致力解决一个类似的问题，他提出了中性的技术进步是否需要新的投资，并认为这是个定义的问题——也就是说答案取决于是不是选用了劳动或产品的价值标准。他的偏好是选择后者，这其中的原因颇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78页。实际上，美国的工会组织劳联—产联在其出版的题为“自动化和技术变迁”的文件(1958年)中写道：“事实上，自动化在其最大的意义上也是对劳动衡量的结果……有了自动化，你无法衡量单个工人的产出，你只能衡量设备的使用效率。如果这是一个可以一般化的概念的话，那么，我们也就不再有任何实行计件工资和计时工资的理由了。”

②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伦敦：麦克米兰公司，1936.38~39

多，不在此详谈。^①

劳动标准和产品标准的区别分别对应于价值层面和实物层面的区别。对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微观经济学几乎完全是在价值的海洋里航行；而宏观经济学——尤其是动态的——则很难将其主题置于现实的或实物的层面之外。对没有技术变化的短期问题更感兴趣的凯恩斯选择了劳动标准；哈罗德因其更关注动态经济学而选择了产品标准。依此来看，两人的选择都是很容易理解的。

说完这一点后，须马上补充一下，动态的宏观经济学如果不想背离经济学本质的话就必须涉猎价值层面。我们的任务是以恰当的方式把这两个层面结合起来，当然，它的难度是很大的。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解决办法是为整个经济建立两个大部类 (tableau)。他所用的组合两者的原则是两重性的。一方面，他把所有的产品分成了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这个分类主要是从产品物质使用 (material use) 的角度进行的。它超越了具体的生产方式，也就是说，这种分类不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另一方面，马克思把所有的产品分成了三个价值成分，即不变资本 (C)、可变资本 (V) 和剩余价值 (S)。这种分法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特点。不变资本包括燃料、原材料的成本以及折旧；之所以叫不变资本是因为它的实物构成价值只是转移到产品中去了，价值量并未改变。可变成本指的是用来支付工资的那部分资本；之所以叫可变成本是因为它是所有新价值的源泉，可变性是它存在的惟一理由。至于剩余价值，马克思将其看做工人创造的新价值中超过了他们工资的剩余部分，即“被资本家剥削占有的那部分”。

当我们运用这两个对社会总产品分类的原则时，我们共有六

① R.F. 哈罗德，动态经济学，伦敦：麦克米兰公司，1948.28~34

个集合，下标号为 1 的式子是指生产资料部分，标号为 2 的式子是指消费资料部分：

$$C_1 + V_1 + S_1$$

$$C_2 + V_2 + S_2$$

它们以最简洁的方式表达了商品流通的部类。说它是部类，是因为这六个类别相互作用，每一个类别都同时是①现实层面某一产品的组成部分，即要么是生产资料，要么是消费资料；②也是价值层面的某一部分，要么是可变资本，要么是不变资本或是剩余价值；③最后还是对现实层面某一产品的需求，即可能是对生产资料也可能是对消费资料的需求。这样，每一部类就成了一个独立的^①不受外界影响（self-contained）的系统，其中价值层面的每一类别本身就是对具体存在于某一部类中的产品的需求。

如果我们看看一个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形，这种循环模式的意义就会一目了然。例如，在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想象得到，劳动力成本和工人对消费品的需求是脱节的。工人的购买力可能会受到并非是成本结构所固有的原则的左右；而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成本耗费产生了对某物的直接需求。所以，降低工资率尽管可能会改善成本价格的失调，但却会在事实上（ipso facto）降低有效需求。马克思的部类概念虽然简单，但却清楚地揭示了这种机制。

当然，我们还可以朝现实再迈进一步，把储蓄或积累引进到马克思的部类中，而保持其基本特点不变。剩余价值（S）的一部分供资本家消费（Sk），一部分用来购买生产资料（Sc），最后一部分则用来购买更多的劳动力（Sv）。那么整个部类就可以重写如下：

$$C_1 + V_1 + Sk_1 + Sc_1 + Sv_1$$

$$C_2 + V_2 + Sk_2 + Sc_2 + Sv_2$$

各类别之间互为关联，可以顺畅地进行交易，这使得整个系统不会碰到超额生产或消费不足的问题。为了使每一种劳动产品的供求均衡，只要满足下列的等式就行了。^①

$$V_1 + Sk_1 + Sv_1 = C_2 + Sc_2$$

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等式的内涵就积累的本质发表一些有意义的看法。例如，社会总劳动在两大部类中所占的比例取决于以下因素：①剩余价值率（ S/V ），②资本的有机构成（ C/V ），以及③积累率（ Sc/S ）。但在此不复赘言。^②

还有一点我想说明的是关于区分价值层面和现实层面的必要性的问题。换句话说，我想批评一下近来把使用科布·道格拉斯总生产函数模型（Functions of Cobb - Douglas）来评估技术进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程度当做时髦的人。^③ 根据该基本模型的假说，除了资本和劳动以外，技术进步也有助于扩大总产品量（现实层面）；但它还假说生产出的产品是完全分布在两大生产要素之中的，即资本和劳动（价值层面）。使用这样一个模型，再辅之以几个越来越简化的假说，人们“发现”：根据历史统计数据，在增加的产出中有一半以上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剩余”（residual），而非节约或资本生成（capital formation）的结果。^④

这里存在一个令人糊涂的基本问题，即有人尝试用古典形式下的资本主义分配方式（价值层面）来明确几个基本要素（现实层面）对生产的相对贡献率。

① 使每一个类别中的供给和需求相等，去除两边相同的条件就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

② 这个问题将在第二章详细论述。

③ 我在一篇文章中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见：繁人都重，技术对生产力的影响，经济发展问题，爱德华·A.G. 罗宾逊编，伦敦：麦克米兰公司，1965

④ 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1版，东京：麦格劳—希尔，1979.703

尤为困难的是科布·道格拉斯总函数中资本的单位选择。约翰森 (Johansen) 意识到了这个困难, 所以他提出了一个不需要存量资本统计数字的经验性分析模型。^① 不过, 他还是借助了“使用资本所带来的成本”。其实, 这是利润率, 即一个比例, 无论它多么模棱两可、含糊不清, 它都可以被预先假设为一种衡量资本的尺度。在科布·道格拉斯总函数概念限定下的资本, 和通常用来计算利润率的资本之间, 可以说被一系列难以越过的桥梁隔开了。例如, 我们不妨假设这个世界只有一种机器。就像索洛 (Solow) 所说的, “人们想衡量的最好是资本的年流量”。机器和劳动力一样, 其自身寿命也是有限的。只要频频地被使用, 就可以认为它每年提供的是或多或少相同“数量”的服务。但和计算利润率相关的机器的价值却会随着它接近使用年限而降低。这个困难固然可以通过计算资本的总存量而非净存量的办法得到解决, 但机器耐用程度的变化会影响总资本价值的大小, 却不会改变机器当时能提供的服务“量”(quantity)。^② 其次, 一个机器的产出能力和人一样, 可以在不改变机器的耐用性或劳动时间长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进步得到提高。这样的机器难道不该作为简单机器的倍数而考虑在科布·道格拉斯函数中吗? 第三, 比较一下, 两台机器各方面都一样 (包括耐用性和使用时间), 只是有一台是来自于产品工资率高的经济制度中。正像琼·罗宾逊 (Joan Robinson) 指出的那样: 两台机器的价值是不同的, 在这两台机器上的预期的投资回报就是不一样的。减少工资率后两者的价值差异保持不变, 原因在于在两个不同的产品工资率中, 利润率

① 利夫·约翰森, 在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生产函数中分开资本积累和资本转移效应的方法, 经济学杂志, 1961 (12): 775

② 在这一点上, 索洛说“对此毫无办法”。罗伯特·索洛, 技术变革和总生产函数, 经济学统计学评论, 1957 (8): 314

——自然也包括利息率——是不同的。^①此外，在现实世界中使用的机器种类千差万别，既有替代性的也有互补性的，这样就会出现一些无法克服的困难。还有，与计算利润有关的资本不仅包括固定资本，还包括运营资本。有些经济学家仍生活在新古典理论盛行的时代，他们喜欢把马克思所说的“可变资本”（variable capital）（如产品销售前支付的工资）当做资本的一部分。

换言之，从根本上说，资本是个价值概念；价值涵义无法摆脱利息率、工资率变化的时间模式的影响，除非我们假设出一个彻底简化了的经济模式，在这种经济模式中，只有一种机器，且它永远不会有技术上的改进。

另一方面，生产的现实或者说实物的层面只能进行描述而不能很容易地进行抽象的分析。无论一个社会采用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整个社会的生产过程需要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这些成员的能力大小有别，他们使用产生于自然的物体作用于自然，尽管自然禀赋和社会环境并非处处完全一致。一般的人在一生中的任何时刻，都可能会承袭来自于先辈们的技术上和文化上的传统。那些少数几个可以对某一生产单位做出决策的人可能会有很强的进取心，但这种进取心可能受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或天性的制约；另外，语言因素的制约也不可小视。这一点通过对比以下三国的语言就可以看出来。日语具有表音的倾向；汉语中眼花缭乱的字要很多年才能掌握；印度语具有多语混杂并存的特点，无法适应现代科技的发展需求。此外，应当说明的是，物质在使用价值意义上的平衡对于生产的现实或实物层面是非常重要的。

一旦我们把视野转向了生产的价值层面，我们在讨论中就无

① 琼·罗宾逊：生产函数和资本理论：一个答复，经济研究评论，1955—1956；